

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战略： 典型特征、动态测度与实践路径

邹 薇

摘 要 新时代新征程,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任务。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重大挑战,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全球经济的大趋势。新型工业化的中国路径体现了既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中国新型工业化指标体系包括规模、结构、创新、效能、低碳、开放六个维度,全国和省级层面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都与经济发展正向相关,各地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具有明显差异,主要影响因素分为工业规模和盈利能力、技术发明与开放水平、高新产业与科技投入、实体经济与绿色发展四大类。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路径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工业化、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型工业化应用场景和标准体系,以及因地制宜培育新型工业化的新优势。

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中国特色;动态测度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4-0012-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68)

纵观世界历史,工业化的进程与水平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推动全球创新版图、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的重塑^[1](P9)^[2](P47-48)。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到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握世界新工业革命时代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的重大机遇,我们要深刻分析新型工业化的中国特征,科学测度新型工业化的动态演进,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全球经济大趋势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自 2008 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 GDP 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超过发达国家,2023 年该份额较 2008 年提高 7.6 个百分点、上升至 58.9%。中美经济的差距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从 2000 至 2021 年,中国与美国 GDP 的比值由 11.8% 上升到 73.40%;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由 3.6% 上升到 17.24%,而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占比由 30.52% 下降到 23.49%。目前,发达国家纷纷加快推进前沿科技成果在现代工业的应用,将给世界产业链体系和经贸格局带来显著影响。

科技革命是工业革命或工业化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业化是“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3](P565)的过程,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4](P207)。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等

领域的科技进步明显加快,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元宇宙、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正在取得颠覆性突破。制造业发展呈现出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和定制化等趋势性变化,标志着新工业革命的肇始和蔓延。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闭幕后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认为,人类已进入新工业革命时代。与以往的工业革命不同,在新工业革命时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开展,生产、交易和消费中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的界限趋于淡化,将全球工业发展推向新高度。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竞相提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口号,给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带来冲击。自2022年底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等官方文件,提出加强战略性公共投资,“实施现代工业和创新战略”“再次振兴:生物科技与美国产业政策”“再次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等一系列方案。可以预见,新技术革命和现代工业领域的竞争是大国经济博弈的主战场。在新工业革命时代,新型工业化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工业的生产模式、产业形态和组织方式,而且正带来全球竞争博弈格局和国家经济实力比拼的大变化。

世界经济史表明,准确地把握全球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关系到长期发展的国运,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进而引领科技革命,成为世界强国。主要发达国家因较早推动工业化而兴,并且始终以工业为发展之基。根据世界银行1994-2020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各国工业增加值与该国GDP的变动趋势十分接近。其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加拿大等六国的工业增加值和GDP曲线均保持向上趋势,且幅度基本相同;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三国的工业增加值均在2008年前后开始放缓增速,GDP也相应地出现下降。制造业的发展对各国经济具有战略性、基础性支撑作用。2000-2020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与GDP变动趋势也保持高度正向关系。其中,美国2013年以来制造业增加值超过同期和GDP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引领拉动作用;德国和英国制造业产值与同期GDP十分接近且同步变化,体现了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支撑作用;而其他发达国家,如法国、奥地利、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其制造业产值低于同期GDP,以致经济增长动力相对不足。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的进程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且工业化的水平成为决定各国发展走向“大分叉”的关键^[5](P3-17)。撒哈拉以南的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工业化水平极低、缺乏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因而落入了“低收入增长陷阱”。而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考察,发现许多国家随着财富增长,在人均GDP达到美国年度水平的10%时,通常会掉入一个增长“陷阱”。这一水平相当于现价8000美元左右时,处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中段位置。按照世界银行2023年划分标准,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1136美元到13845美元之间,108个国家被列入该组别,这些国家共有60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5%,在全球的GDP占比超过40%。尽管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为数众多,但是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累计大约2亿人口成功跻身于高收入行列。这些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均偏小,它们有的得益于加入欧盟,有的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也有一些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本地制造业升级。世界银行提出发展中国家要跨入高收入行列,必须有序地实施“投资、引进和创新(investment, infusion and innovation)”三个战略,称为“3i战略”^[6](P1-3, 7)。低收入国家处在1i阶段:投资,它们通常只专注于资本积累和投资,促进劳动或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化。中等偏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处在2i阶段:投资和引进,它们会调整产业方向,更多地引进国外企业、投资,采纳来自国外的适宜技术,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等偏高收入水平阶段的国家处在3i阶段:投资、引进和创新。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大对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的投入,致力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附加价值较高的制造业。可见,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提升路径,在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采取不断换挡和逐步复杂化的政策组合来推进工业化。许多中等偏高收入国家正是由于没有换挡到3i阶

段,尤其是缺乏创新,在经济结构转型、产业体系构建、收入分配改善、地区差距缩小、社会治理完善等方面乏善可陈,以至于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陷入停滞状态。

新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为各国推进工业化跃迁提供了新机遇,也对政府制定和实施适应科技创新步伐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新挑战。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口众多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关键的中后期,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与合作互演的时代,中美之间的竞争焦点由“贸易脱钩”转向“产业争夺”。我国必须敏锐地把握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顺应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方向,主动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多元化的复合行动路径,超前部署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新目标、新领域、新路径、新政策,建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化事实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命脉所在。我国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并指出,实体经济是我国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7][8][9]}。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2023年9月召开首次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明确提出“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到新型工业化全过程”^[10]的新定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加快新型工业化,将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就是探索和践行新型工业化路径的过程。我国新型工业化不仅是量的持续增长,而且是质的有效提升过程;不仅是少数发达省份的工业发展,而且是统筹全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和跃升,是以工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新型工业化的中国路径体现了既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

首先,中国新型工业化具有全方位、全产业特征。与早期发达国家在某些具备资源优势的地区或者某些具有技术突破的产业推进工业化不同,中国新型工业化走的是门类全、规模大的整体推动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个奇迹。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我国拥有包括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制造品种之齐全、门类之完备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截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四成,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11][12]},有效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可比数据,比较了2004-2020年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如图1所示)。从中可知,相比而言,德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较高,但是基本上在20%上下,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曾经短暂下挫,此后又恢复到20%的水平。奥地利和意大利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徘徊在15%附近,总体比较平稳。美国、葡萄牙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略有下降,处在12%左右。加拿大、法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比较明显,英国该比重原本不高,已下降到不足5%。与这些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总体位于25%-32%区间,历年来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情形。2015年之后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略有下降,但是仍高于25%。因此,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始终坚持把发展壮大制造业放在重要位置,努力建设制造强国,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和突出优势。

其次,中国新型工业化具有持续性、跨越性特征。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更大,工业化担负着保障商品供给、提供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维护经济安全等一系列重要使命,因此中国新型工业化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始终保持稳健的步伐。我们把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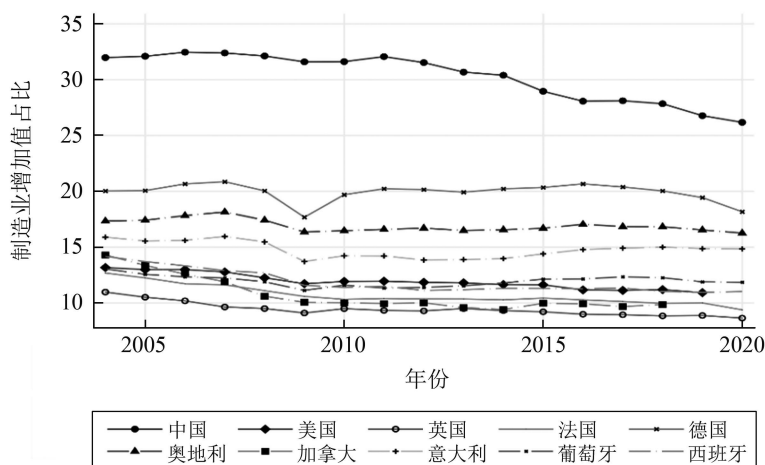


图1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比较

202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主要金砖国家进行比较(如图2所示)。这些国家都是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发展。比较发现,我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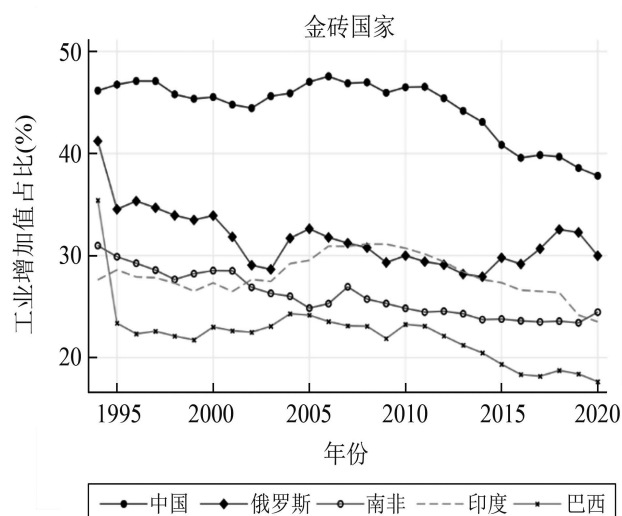


图2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与主要金砖国家比较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所有年份均比其他金砖国家更高。在1994-2011年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超过45%,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比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更高。相比之下,俄罗斯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94年曾经超过40%,此后就处于动荡下降中,尽管2018-2019年略有反弹,但是2020年再次下降至30%。印度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94-2008年期间总体上升,但是此后就进入下降通道,2020年该比重仅为25%左右。南非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94年超过30%,但是总体上处在逐步下降区间,到2020年略高于印度,大约26%。巴西在199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南非和印度,约为36%,但是巴西工业发展明显趋缓,到202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主要金砖国家排在末位。可见,同样处在工业化关键性的阶段,唯有中国始终坚持把发展工业经济放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

强劲的工业发展是我国经济总体规模和人均GDP倍增的重要推动力。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5000美元,比日本、韩国人均GDP首次超过5000美元分别晚35

年、22年,但是,201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3.51万亿现价美元)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相当于同期日本的2.11倍,韩国的8.13倍。从2011年到201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由16.9%上升到23.5%,同期我国以庞大的人口规模,仅用8年时间实现了人均GDP从5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跨越,耗时比新西兰、以色列、爱尔兰等许多国家人均GDP从5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倍增时间都短。我们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二战以来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关系。研究发现当人均GDP开始增加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随之增加,当人均GDP超过一定程度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减少,即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通过上述关系,可计算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拐点处的人均GDP约为1.4万美元。2023年我国人均GDP约为1.34万美元^[13],距离测算的拐点还需要最后一段冲刺。因此,我国现阶段仍然高度重视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其三,中国新型工业化更加注重以创新增进工业化动能。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与新挑战。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主导,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赛道不断涌现,大国对科技制高点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夹逼竞争局面。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优势弥补其劳动力成本劣势,力图强化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操控力;另一方面,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产品内分工降低了后发国家发展工业的难度,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成本攀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着后发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压力。因此,中国新型工业化始终坚持把创新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增进工业化的新动力源。

如表1所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世界各国创新指数的评估,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总体排名和分项排名均稳步提升。2014年我国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30位,仅仅4年后就于2018年首次进入前20位,到2022年排名已上升到第11位,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中处在领先地位,也是跻身排名前30名的全球科技创新第一阵营的唯一发展中大国。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考察的各分项创新指标而言,从2012年到2024年,我国创新投入排名由第55为上升至前25名以内,制度排名由第121位上升至前45位以内,人力资本和科研排名由第84位上升至第22位,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由第39位跃居第5位。这样的上升幅度在所有国家中是前所未有的,也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大国的地位。

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注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R&D)投入达33357亿元,比1991年增长233倍。2023年全球专利申请活动

表1 我国创新指数及相关指标排名:2012-2024年

年份	指 标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创新投入	制度	人力与科研	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成熟度	经商成熟度
2012	34	55	121	84	39	35	28
2013	35	46	113	36	44	35	33
2014	29	45	114	32	39	54	32
2015	29	41	91	31	32	59	31
2016	25	29	79	29	36	21	7
2017	22	31	78	25	27	28	9
2018	17	27	70	23	29	25	9
2019	14	26	60	25	26	21	14
2020	14	26	62	21	36	19	15
2021	12	25	61	21	24	16	13
2022	11	21	42	20	25	12	12
2023	12	24	43	22	27	13	20
2024	11	23	44	22	5	16	11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各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量再创新高,申请量首次突破350万件,其中中国专利申请量约为164万件,增速结束此前两年的放缓趋势、重新回升至3.7%,自2019年来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根据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2014年至2023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超过3.8万件,占全部专利数量的70.3%,居世界第一。目前世界上拥有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最多的前十家企业中,7个是中国企业。《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位居世界第一,已连续第二年荣登榜首。全球十大科技创新集群榜中有7个在亚洲,其中4个在中国。我国通过在以超大、特大城市为引领的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密度分布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创新产业的集合体,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不断塑造和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其四,中国新型工业化更加注重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海外扩张,又不同于二战后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导向战略,中国新型工业化强调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资源配置能力,加速产业链供应链锻造和企业转型升级。自2013年以来,中国稳居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近年来应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纷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流等冲击,中国制造仍然在全球市场显现了强大的竞争力。202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这个规模比2020年增加了11.63万亿元,4年的增量是“十三五”期间5年增量的1.5倍。与此同时,中国外贸依存度总体逐渐下降,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性持续降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由45.32%下降到34.12%,下降超过11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低于韩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仅高于日本和美国。与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相比,2012年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低于墨西哥,但是超过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菲律宾等国,到2021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下降到低于菲律宾、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总体上,我国新型工业化正在由依靠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向依靠技术水平和竞争优势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远超初级产品出口,202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高达95.1%,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58.5%。

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始终注重协调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就国内市场而言,内需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近年来,全社会零售商品销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消费和投资这两架“马车”对于稳增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有效地抵御了由于疫情冲击、供应链断裂、贸易争端等引起的外部市场不利冲击。我国既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又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优势,可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持续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的机制。另一方面,就国际市场而言,中国在“走出去”的同时,更加注重“引进来”,着力引领双向投资,打造“投资中国”品牌^[14]。中国加大海外投资力度,通过扩大在岸制造、全球制造的平台,更好地促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统计数据表明,2023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96万亿美元^[15](P2-4),已连续12年排名全球前三。同时,中国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种创新举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地吸引了世界各国来中国投资。近年来,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持续推动产品和服务供给升级。

最后,中国新型工业化更加注重协同性、整体性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工业化是一个漫长曲折和逐渐进步的过程。在过往的工业革命中,少数“领先国家”与其他“跟随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发展水平上更是极其悬殊;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相对先进的城市工业地区与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存在巨大差异。马克思曾经指出,“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3](P567)。自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

息化顺次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必须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6](P159)。

从古到今,我国工业化经历了从走弯路到实现弯道超车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总量,兴于盛唐,强于大宋,工场手工业尤其发达,曾经几乎断层式地领先于世界。据中国社会经济史料,1078年北宋产铁12.5万吨,而600多年后的1700年西欧产铁15.1万-18.5万吨,英国1788年产铁7.6万吨。到清朝晚期,在强化封建统治、坚守农耕文明、错失工业化机遇,遭受西方列强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之后,191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下降到8.9%^[17](P104,183)。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但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虽然他制定的《建国方略》中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指出工业革命之后,采用机器生产的国家,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坚强的、思想统一的领导集团持之以恒地来实施工业化,结果只能愈益落后于西方^[18](P83-97,219-222)。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仅为4.5%。旧中国积贫积弱,工业化严重滞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业化以异军突起之势迅速崛起。中国仅用60-70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工业化历程,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典范^[19](P1)。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的“四化并进”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突出特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和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的“四化并进”体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工业化与信息化互促互融。工业化的进程必须不断促进最新科技进步,并且在工业各领域广泛采用新科技成果。在数字化、智能化迅速推进的新时代,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中国在“两化融合”推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举措,培育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推进各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跨界聚合的产业生态和示范企业。其二,工业化与城镇化并行不悖。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农村农业支持工业化、到工业化成果反哺农村农业,再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进程。2024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6.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67%^[13],工业化和城镇化均进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目前,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互融,体现为更加注重进程同步,缩小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更加注重转型提质,促进地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协同发展,提高要素配置、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的空间效能。其三,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密不可分。工业化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是农业、农村、农民迈向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中国高度重视处理好工农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收到实效。我国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装备支持、技术支撑、信息保障、管理经验和服务体系。其四,“四化并进”并不是说各地区步调整齐划一。我国要求各地区根据发展阶段、禀赋条件、产业基础等,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此,在不同地区有区别、有重点地推动“四化并进”,是中国区域平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义。

三、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动态测度

近年来,关于我国新型工业化的研究定性分析居多,量化测度较少。有的学者探讨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和现实要求,提出建设制造强国的建议^[20](P4-21)^[21](P56-66)^[22](P15-16)。许多研究者分析了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现阶段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战略任务^[23](P3-13)^[24](P5-19)^[25](P1-6)。任保平侧重探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对新型工业化的影

响^[26](P28-37)。李鹏、蒋美琴构造了一个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但是考察年份仅限于2016-2020年,而且仅在全国四个区域层次开展评价,缺乏对我国新型工业化整体进程的研究^[27](P3-16)。左璇等采用定基指数法设计并测算得出我国2020-2022年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但是该文仅采用全国数据,分析了三个年份新型工业化的指数情况,并未就更长的时间段、各省份的具体发展状况展开分析,也未探讨新型工业化的实施路径^[28](P5-16)。鉴往知来,为了系统地研究我国各地在进入21世纪以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经验,为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借鉴,本文构造了2001-2020年全国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本文选取6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如表2所示),综合考察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规模、结构、创新、效能、低碳、对外开放六个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商务部、Winds、CNRDS、CSMAR、CEADs等数据库,对于个别年份的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全,包含全国30个省(区、市)。因数据缺失或统计口径不一,未列入西藏、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表2 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备注
新型工业化 发展指标	规模	工业总产值(x1)	《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	+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速(x2)	《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	+
	结构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x3)	《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	+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比重(x4)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
	创新	研发投入(R&D)占GDP比重(x5)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
		研发人员占比(x6)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
		发明专利数量(x7)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效能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及户均主营业务收入(x8)	CNRDS	+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以及平均利润以及利润率(x9)	CNRDS	+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x10)	CNRDS	-
		制造业上市公司数目(x11)	CSMAR	+
		制造业城镇员工工资(x12)	Wind	+
	低碳	每万元GDP能源消耗(x13)	国家统计局	-
		碳排放(CO ₂ ,或者SO ₂)(x14)	CEADs	-
	开放	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差额(x15)	国家统计局	+
		对外直接投资额(x16)	商务部	+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x17)	国家统计局	+

注:“+”、“-”分别表示该指标为正向、逆向指标。

本文测算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之间量纲的差异。令 X_{ij} 表示第 i 个指标在第 j 个地区的数值, $X_{\max}$ 和 $X_{\min}$ 分别表示该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Y_{ij} ($0 \leq Y_{ij} \leq 1$)表示第 i 个指标经过标准化后的数值,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的标准化过程分别为: $Y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和 $Y_{ij} = \frac{X_{\max} - X_{ij}}{X_{\max} - X_{\min}}$ 。初始指标经过标准化后,所有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其次,采用

客观赋权法熵值法确定指标的权重^①。最后,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对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标进行测度。结果见表3。

表3 2001-2020年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的测算和排名

排名	2001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9年		2020年	
1	广东	0.71	广东	0.75	广东	0.72	广东	0.82	广东	0.80	广东	0.79
2	上海	0.59	江苏	0.61	江苏	0.57	江苏	0.72	江苏	0.68	江苏	0.69
3	江苏	0.51	上海	0.59	上海	0.53	天津	0.59	浙江	0.57	浙江	0.56
4	山东	0.49	天津	0.52	天津	0.47	山东	0.57	上海	0.51	上海	0.50
5	天津	0.47	山东	0.52	山东	0.45	上海	0.56	福建	0.48	山东	0.50
6	浙江	0.45	浙江	0.47	浙江	0.45	浙江	0.55	山东	0.48	福建	0.47
7	北京	0.42	福建	0.39	福建	0.40	福建	0.46	江西	0.45	江西	0.46
8	福建	0.41	黑龙江	0.39	北京	0.39	北京	0.45	安徽	0.45	安徽	0.45
9	黑龙江	0.38	北京	0.38	辽宁	0.37	重庆	0.44	湖南	0.45	重庆	0.45
10	辽宁	0.36	辽宁	0.36	江西	0.37	安徽	0.43	湖北	0.45	湖南	0.44
11	湖北	0.35	陕西	0.35	安徽	0.36	湖北	0.43	河南	0.43	天津	0.42
12	四川	0.34	四川	0.34	湖北	0.35	湖南	0.42	天津	0.43	北京	0.42
13	陕西	0.34	湖北	0.34	陕西	0.35	河南	0.42	北京	0.42	河南	0.42
14	重庆	0.34	河南	0.33	广西	0.34	江西	0.42	重庆	0.42	四川	0.41
15	宁夏	0.32	江西	0.33	湖南	0.34	四川	0.38	四川	0.41	湖北	0.38
16	河南	0.31	安徽	0.32	四川	0.33	陕西	0.37	陕西	0.40	陕西	0.38
17	吉林	0.31	重庆	0.32	河南	0.32	吉林	0.36	辽宁	0.33	吉林	0.33
18	湖南	0.30	山西	0.31	黑龙江	0.32	广西	0.33	云南	0.32	河北	0.32
19	云南	0.29	新疆	0.30	重庆	0.30	辽宁	0.32	吉林	0.32	云南	0.32
20	安徽	0.29	吉林	0.30	吉林	0.29	河北	0.31	广西	0.32	贵州	0.32
21	海南	0.29	河北	0.29	新疆	0.29	贵州	0.30	河北	0.32	广西	0.32
22	江西	0.29	湖南	0.28	甘肃	0.29	海南	0.28	贵州	0.31	辽宁	0.31
23	广西	0.28	青海	0.28	山西	0.28	黑龙江	0.28	山西	0.30	山西	0.31
24	河北	0.27	广西	0.27	海南	0.27	云南	0.28	宁夏	0.28	宁夏	0.27
25	甘肃	0.27	内蒙古	0.27	云南	0.27	内蒙古	0.27	甘肃	0.28	甘肃	0.27
26	青海	0.26	甘肃	0.26	河北	0.26	宁夏	0.25	海南	0.27	海南	0.26
27	新疆	0.26	云南	0.25	内蒙古	0.25	甘肃	0.24	黑龙江	0.26	青海	0.26
28	贵州	0.24	贵州	0.24	青海	0.24	青海	0.23	内蒙古	0.24	内蒙古	0.24
29	内蒙古	0.23	海南	0.24	宁夏	0.22	山西	0.22	青海	0.24	黑龙江	0.23
30	山西	0.22	宁夏	0.22	贵州	0.22	新疆	0.19	新疆	0.22	新疆	0.21

注:表中的评分表示的是各省(区、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值,在此选取2001、2005、2010、2015、2019和2020年的数值予以报告。因篇幅所限,未列出所有年份的计算结果。

通过比较分析,我国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路径具有如下显著特点。首先,各省(区、市)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2001-2020年间,我国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和福建,一直在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排名中处在靠前位置。而一些西北、西南欠发达地区的省(区、市),例如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工业化发展水平处在排名落后状态。我们采用了多种计量

① 具体做法是:令 m 个对象 n 个指标的初始矩阵为 $Z = (Y_{ij})_{m \times n}$;第 j 个地区在第 i 个指标的占该指标的比重为 $\rho_{ij} = Y_{ij} / \sum_{j=1}^m Y_{ij}$;第 i 个指标的熵值为

$$e_j = -k \sum_{j=1}^m \rho_{ij} \ln \rho_{ij}, \text{ 其中, } k = 1/\ln m; \text{ 信息熵为 } d_i = 1 - e_i; \text{ 第 } i \text{ 个指标的权重为 } w_i = d_i / \sum_{i=1}^n d_i。$$

模式,把各省(区、市)标准化后的人均GDP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各项指标进行回归分析^①。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比重、发明专利数量、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以及平均利润以及利润率、制造业上市公司数目和制造业城镇员工工资等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正效应,而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碳排放量等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其次,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不同。我们把各省(区、市)标准化后的人均GDP对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各项指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发现,与人均GDP之间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的变量包括: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速、研发人员占比、发明专利数量、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及户均主营业务收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以及平均利润以及利润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制造业上市公司数目、制造业城镇员工工资、每万元GDP能源消耗、碳排放、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差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等。上述变量涵盖了工业发展的规模、结构、创新、效能、低碳、开放等各维度,表明新型工业化发展与各地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

其三,就分项指标比较,不同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各维度的细分指标表现各异。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工业大省在规模、结构、创新、效能和开放等维度均位居前列,特别是这些传统工业大省不仅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速等指标上持续表现强劲,而且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比重等指标的排名更是牢牢占据头部位次。一些中西部省(区、市),如湖北、湖南、安徽不仅近年来在工业规模上不断壮大,而且在创新维度表现突出,尤其是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研发人员占比等指标上进步明显,说明创新引领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大有可为。在开放维度,除了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外,湖南、河南、安徽和江西等内陆省(区、市)也呈现明显进步,表明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上已经展现成效。在低碳发展维度,海南、重庆、云南、江西、吉林等省(区、市)的得分排名进入前十,表明我国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也并没有单纯追求工业产量,而是在降低单位能耗、减少碳排放上走绿色低碳工业化的新路。

其四,根据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排名与人均GDP排名,可以区分四类发展类型。第一类是“高一高”组合,即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与人均GDP水平均较高、排名均靠前,以此类推,第二、三、四类分别对应于“高一低”“低一低”“低一高”组合。比较可见,在2001年,“高一高”省(区、市)有10个,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东北,其他中西部省(区、市)都要么是“低一低”类型,要么工业发展与人均GDP的排名错位。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到2020年,第一类“高一高”组合除了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传统工业大省、经济大省,以及位于东部的上海、北京和天津直辖市,湖北、湖南、安徽、重庆等中西部省(区、市)陆续跻身该阵营,但是东北三省的排名明显下滑至处于“低一高”、甚至“低一低”类型。2020年,处于“低一高”和“高一低”类型的省(区、市)的排名差距明显减少,表明以工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在更广泛区域得以呈现。

最后,我们通过动态因子分析^②,筛选出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因素是工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对应的公共因子包括: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及户均主营业务

① 本文采用OLS、静态和动态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各种模型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差别并不大,但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OLS回归由于没有考虑到时间和个体间的差异情况,因而仅作为与其他模型对照的参照。对于静态面板中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从Hausman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p值为0.000,拒绝随机效应更优的原假设,因而选择固定效应更好。对比动态面板GMM的回归结果,从Sargan检验和AR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Sargan统计量强烈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差分GMM方法和系统GMM方法并不是更有效的。于是,本文着重考察的是静态面板的固定效应对标准化后的人均GDP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各指标的回归结果。受篇幅所限,未列出所有回归结果。

② 具体步骤是:首先,采用主成分方法提取公因子,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方法,提取4个公因子,可以发现4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75.85%,模型比较显著。其次,计算主成分与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就是因子载荷。最后,构建因子分析旋转成分矩阵,得到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并进行主因子排序。

收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以及平均利润以及利润率、制造业城镇员工工资、亏损企业亏损总额(负向指标)和工业总产值。第二类因素是技术发明与开放水平。对应的公共因子包括:对外直接投资额、发明专利数量、制造业上市公司数目、每万元GDP能源消耗、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差额大。第三类因素是高新产业与科技投入。对应的公共因子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比重、R&D占GDP比重、研发人员占比、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第四类因素是实体经济与绿色发展。对应的公共因子包括: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碳排放、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速。总体而言,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在于更大力度地增强工业规模实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企业、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动最新科技成果赋能实体经济持续壮大。

四、加快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路径

工业强则经济强。面临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难预料性,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为此,基于对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化事实分析和动态测度,提出现阶段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

其一,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工业化。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无人系统技术等进入爆发期,融合技术不断催生颠覆性创新和产业发展新赛道,社会域、认知域的斗争已逐渐演变为力量博弈的新领域和新风口。新质生产力是改变现代大国竞争游戏规则的关键,必须紧紧扭住新兴科技这把“胜利之钥”。在多年来的工业化发展实践中,我国积累了在技术跟随、追赶阶段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提升产业体系的经验,现阶段要锚定科技创新最前沿,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工业化站上新台阶。具体实施路径包括:首先,在创新战略上,要健全国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新时代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规划。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关键产业领域领先优势;锚定全球科技最前沿,整合全国科技资源,发挥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国家队”的科技攻关力量,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其次,在创新路径上,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中间品创新、产业链创新。要把握中间品的科技含量高、产品迭代快、产业生态复杂、基础科研要求高等特点,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攻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链为依托的科研组织模式,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中间品技术开发、到市场化应用、再到全产业化再造的完整创新链条。第三,在创新管理体制上,要加强有组织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在新工业革命时代,基础研究领域的持续深耕和重大突破对于国际科技竞争至关重要。因此,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建设科教融合、层次分明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前沿、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完备、覆盖广泛的创新服务体系,多元参与、高效协同的创新治理体系,以基础研究突破来带动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涌现。

其二,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现新一轮工业倍增。分析表明,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与GDP增长路径具有同步性特征,在1994-2021年间,我国工业增加值和GDP均经历了翻两番(即增四倍)。以1994年工业增加值为基期,工业增加值第一次倍增(1994-2000年)、第二次倍增(2000-2006年)、第三次倍增(2006-2010年)的路径和时间长度与GDP的倍增高度重合,但是工业增加值第四次倍增(2010-2019年)大约耗时9年,慢于GDP第四次倍增6年(2010-2016年)的耗时,说明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要实现2035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高水平企业梯队,提升工业倍增步伐。具体实施路径包括: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实施产业发展整体规划(2025-2035年)。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必争领域,系统谋划,超前布局。第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应支持多技术路

线探索和交叉融合,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实力较强的领域形成具有突出竞争优势的长板,同时全力突破集成电路生产基础工艺、芯片制造和封装核心设备、高端功能材料、航空发动机、人工智能研发、精密仪器设备和高性能工业母机等短板领域,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成链式发展。第三,全面布局和加快培育未来产业。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动态,我国提出的未来产业方向包括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信息、未来健康和未来空间等。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技术精准识别和率先布局高潜能未来产业。要防止各地一拥而上和低效投资,引导各地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实力、人才储备等因素,有的放矢、错位发展未来产业。第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同时必须认识到,传统产业不等于低端产业,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要锚定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定制化等方向,加大对钢铁、汽车、建材、石化、有色、轻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的技改投入,激发传统产业的新活力。

其三,加强现代化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构建新型工业化应用场景和标准体系。马克思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9](P732)。实践证明,新兴技术的涌现需要坚实的产业基础能力和大量工业应用场景来支撑,以场景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新兴技术迭代、升级和扩散的步伐。同时,我国产业发展已经由跟跑转向并跑和局部领跑,必须前瞻布局和推动标准研制,统筹布局未来产业标准化发展路线,力争在未来全球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具体实施路径包括:第一,增强产业基础能力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作用。要引导生产要素优先向基础产品和技术、基础平台倾斜,保障新型基础工业设施、基础工业创新体系的投入力度和供给能力,完善产业基础文化、基础教育和人才、基础政策措施,提升基础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第二,着力开拓新型工业化场景。人口众多和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是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优势条件,也是开拓新兴工业化应用场景的重要基础。要抓住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爆发式发展机遇,在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在装备制造、流程再造、供应链优化、消费品升级、现代服务业提质等领域不断挖掘和拓展跨界融合的新应用场景,以丰富的场景、海量的数据助力算力、算法领域加快迭代,促进未来产业技术走向成熟。第三,加强标准引领与专利护航。聚焦未来产业的重点领域,研究制定基础通用、核心技术、生产流程、关键产品、安全伦理等标准,推动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和专业技术组织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合作,整合产业链力量共同推进国际标准研制。还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以高质量的专利遴选、评价、推广和保护机制,助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

其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高水平开放,因地制宜培育新型工业化的新优势。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习近平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30](P1-2)。要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让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高科技、高效能、高附加价值的产业畅通流动,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支撑。具体实施路径包括:第一,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资国企效率水平。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如沐春风的政务环境、如鱼得水的市场环境、如火如荼的创新环境、如镜高悬的法治环境,让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第二,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推动资本、劳动、土地、信息、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加强数据确权、交易、跨境传输等基础制度建设,培育数据产业市场主体,构建产业发展良好生态,以数字化、智能化更好赋能新型工业化发展。第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建立健全各地区科技资源的统筹协调机制,实现科技资源的共享与流动;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机制,更好发挥科研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第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要建设科研院所、高等教育与企业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体系;建设

一批未来技术学院,探索复合型、跨界型、融合型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力资源的培养模式;建设一批高水平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为前沿领域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培育、引进和使用创造优越条件。第五,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应加强区域科技管理体制,既促进地方与国家战略衔接,又推动跨区域的科技协同创新。在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要加强高技术的研发和基地建设,提升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和价值创造能力,引领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在中西部地区,应发展区域特色产业,重点提升农业、能源等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路径。东北地区曾经是我国老工业基地,要加强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开拓新兴产业。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深刻把握新工业革命时代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重大机遇和发展趋势,坚定不移地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全面夯实我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价值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发展带动能力,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汇聚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 [1]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5).
- [2] 邹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动态测度与实践路径.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L. Pritchett. Divergence, Big Ti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3).
- [6]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The Middle-income Trap*.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4.
- [7] 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人民日报,2020-04-24.
- [8]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人民日报,2023-04-14.
- [9]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05-06.
- [10] 习近平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 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人民日报,2023-09-23.
-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科技日报,2025-01-22.
- [12]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制造业强起来步伐持续加快.光明日报,2024-02-22.
- [13] 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5-02-28.
- [1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12-12.
- [15]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年度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4.
- [16]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7] 全汉昇.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 [18] 孙中山.建国方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19]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16).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新征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与政策.经济研究,2023,(9).
- [21] 黄群慧.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要求.新型工业化理论与实践,2024,(1).
- [22] 王一鸣.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国金融,2024,(16).
- [23] 史丹.新型工业化及其实施路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新型工业化内涵特征、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23,(3).

- [25] 陈晓东,刘冰冰.新型工业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西部,2024,(6).
- [26] 任保平.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革,2023,(11).
- [27] 李鹏,蒋美琴.中国新型工业化进展、区域差异及推进策略.当代财经,2023,(12).
- [28] 左璇,李君,柳杨等.新型工业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指数研究.新型工业化,2023,(12).
-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0]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11).

Advancing the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ypical Features, Dynamic Measurements and Practical Paths

Zou We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advancing the new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key in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country and the progr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world toda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with a magnitude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facing tremendous challenges from the on-going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dvancing the new industrialization represents a global economic trend.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new industrialization has taken o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set it apart from both ear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other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index system of Chinese new industrialization encompasses six dimensions of scale, structure, innovation, efficiency, low-carbon practices and openness. The level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on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industrial scale and profitability,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and openness,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and the re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e practical path for advancing Chinese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include empowering 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nstructing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standard systems for new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ging new advantages in new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new-industrializ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ynamic measurements

■ 作者简介 邹 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杨 敏